缅怀黄枬森先生

2013 年 1 月 24 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黄枬森先生不幸逝世,燕园和学界顿时沉浸在悲痛之中。

清明节前夕——4 月 3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在我校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了“当代中国哲学家黄枬森先生追思会”。来自首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黄先生的学生、亲属共 70 余人与会,深情追忆黄先生的学术成就、哲学思想和崇高品德,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前景。追思会对黄先生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人们决心沿着黄先生“哲学的足迹”,继续前行。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黄枬森先生曾历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副主编、主编、编委会主任、顾问等,对学报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忱和心血,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黄枬森先生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北大学报的辉煌史册上。我们特刊发三篇纪念文,以表达编辑部同人对黄先生绵绵不竭的缅怀之情——山之巍巍,水之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本刊主编 程郁缀

黄枬森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杨祖陶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黄枬森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哲学教育家,不幸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坎坷而光辉的 92 个年头的生命历程。先生虽然走了,但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执着与坚守的崇高精神,他做出的一大批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均是学界的珍贵遗产,将永远为后学传颂、学习和研究。

黄枬森先生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由于对哲学的兴趣转而学习哲学,成为我国康德哲学先驱研究者郑昕先生的研究生。黄枬森先生的自然科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使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有宽广的视野,深厚的功底和深邃的眼光。他学贯中西,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均深有造诣,熟悉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学风上朴实无华,宽容严谨,守正与创新统一,理论与实际结合,善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不在乎人们说我‘左’还是‘右’,我只坚持我追求的真理”。

黄枬森先生的哲学活动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而真正大展宏图,施展才华,开花结果,著书立说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 30 年。他曾对人说:“我的学术生涯、学术生命,是从改革开放真正开始的。”从这时起,他密切注视着我国的社会现实和哲学事业的发展进程,笔耕不辍,撰写和发表了大量哲学论著,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现实的一些领域,对所有这些领域都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论创新和重大贡献。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因此很难对他的学术成就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估。但我的学术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深深体会到在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的深刻意义与作用。在这里单就我个人的浅见来看,他至少在以下四个领域内,孜孜不倦,建立起来了四座雄伟的学术丰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创新及其新形态问题

摇摇黄枬森先生坚信、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必须把它作为科学来研究、建设和发展。他在 2005 年出版的《哲学的科学化之路》的后记中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写了不少文章，千言万语，可以归结为这句话：把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作为一门科学，它必须有自己研究的对象、关于对象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由它们组成的有逻辑联系的体系。黄枬森先生认为，上世纪 20—30 年代苏联哲学界所构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科学体系。但这个体系不够完整严密，从而大大地影响了它的科学性。他主张在坚持这个体系的基本性质的基础上，根据当代科学与实践的水平，创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这必须从明确和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性质入手来解决这个任务。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对象是三个层次或三个重叠的世界：把世界作为整体来研究，它的一部分是唯物主义（世界的物质图景），一部分是辩证法（世界的一般辩证规律），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类历史当然应当包含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之内，但由于它对人类的至关重要性，可以抽取出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社会论，它的组成部分为：实践论（他认为实践不只是认识的基础，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结构论和人类社会规律论（人类社会辩证法）。而由于意识（或精神）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又可将它从历史观中分离出来与之并列，这就是意识论（或精神论）。它的组成部分是认识论（他认为认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应像过去那样放在世界观部分内，而应放在从历史观，即社会论中分离出来的意识论部分内）、价值论和方法论。黄枬森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学科群，它所包含的学科的数目可以、而且必须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学科的创立有所增加和变化。在 2006 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构想》一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构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个层次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历史观，一个是人学。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由人来构成的，所以需要有专门研究人的人学，由人再进到研究人类实践活动的“实践论”。

黄枬森先生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可以称之为板块结构的体系。他曾尝试按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要求建构了一个包含 36 对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融为一体，可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也可以称为唯物辩证法体系或一般辩证法体系。但他无意用它来替代现有的板块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依然实事求是地认为，如何按照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理，从抽象出发、依据对立统一规律，将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诸组成部分的全部内容建构成一个与现代科学和实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矛盾运动过程，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发展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

但是，如何创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是一个始终萦绕在他心中的一个问题。他深知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要志同道合的人们共同一起来解决。他于是邀请陶德麟、赵风歧、陈先达、陈尚志和蔡德麟等教授一起商讨，决定于 2001 年在深圳召开了一次有全国一百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研讨会，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的理念及其创立和发展

摇摇上世纪 70 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由黄枬森先生牵头的几位学者曾编写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初稿，并曾油印成册交流作为大学教材使用。在这一过程中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的理念开始形成起来。改革开放后，他就从正面阐发了他的这个理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和其他科学一样有它萌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就必定有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相互交织与转化。因此，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发展绝不是像过去以为的那样是少数几个领袖人物的哲学著作所构成的真理加真理、没有什么是非功过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这样一个曲折、复杂、上升的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建立起来,其必然的后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黄枬森先生和其他学者们共同努力,于 1981 年推出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他被公认为是起了第一作用的主要撰稿人和统稿人。1987 年他作为第一主编与北京大学学者共同推出了三卷本、计 120 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他不辞辛苦继续前行,1983—1996 年,他作为第一主编,与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 50 多位学者共同努力,历时 13 载,推出了浩瀚的八卷本、计 400 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巨著,从而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世界前沿,大大超越和突破了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的研究水平。1998 年,他还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一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教材,并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教材。

黄枬森先生在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过程中,显示出他非凡的理论驾驭能力,资料的运用能力,组织领导和相互协作的巨大凝聚力,从而完成了这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学术伟绩。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奠基和创立

上世纪 80 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惨无人道罪行的不很明确的控诉和清算。在这次讨论中有关“人”的理论问题受到文艺界、哲学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见“物”不见“人”的议论。黄枬森先生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方面拒斥了马克思主义不讲人的错误观点,一方面注意到文艺界、学术界所关注的人的理论问题中所指的人是“个人”。他实事求是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空白”虽然不是笼统的“人”的问题,但的的确确是作为“个人”的“人”的问题。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要补充的正是关于“个人”问题的研究,即人学。他在 1983 年 3 月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的全国学术研究会上所作的学术讲演《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中阐发了他的上述那些思想。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对西方和苏联研究人学的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发现西方的萨特、加罗蒂、弗罗姆等人已提出了建设一种科学的人学的任务,但却没有真正走上科学建设的道路。苏联在上世纪 50 年代已出现了一批人学论著,80 年代提出了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任务和“统一的人学是否可能”的问题,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建议。由于苏联解体,这些建议都搁置起来了,但其把人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的思路却是应当肯定的。在这样的基础上,黄枬森先生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和建设一门新的“人学”科学,以便对人做综合性和整体性的跨学科研究。

为此,经过三年的持续努力,以黄枬森先生为第一主编的、包括近 1500 个词条、近 100 万字的《人学辞典》在 1990 年问世了。它标志着一门马克思主义新“人学”创立的开始。

在这以后的十年里,他撰写和发表了多篇讨论人学问题的论文,内容涉及人学的方方面面,后经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成册,就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当代人学问题的专著——《人学的足迹》。在这本著作中,他把人学的研究对象及性质规定为:“它是从各门有关人的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统一中,研究完整的个人及其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在讨论人学理论的基本构架时,他明确地提出,“人性和人的本质”是人学的第一个根本问题,它要回答的是“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而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人学的第二个根本问题则是包括“人权”在内的“人的价值和自我价值”问题。

本世纪初,黄枬森先生在他主编的《人学原理》的导论中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对他 20 年来人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概括和总结。2005 年他在与人合著的《人学原理》中又以整整的一章详细地论述和发挥了“人的发展规律”的内容,这些规律共有 7 条:(1)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2)人的实践活动和

其他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⑶）人的社会存在和意识相互作用的规律；⑷）人的个体发展的有限性和类的发展的无限性相互蕴涵的规律；⑸）人的实践的自发性递减与自觉性递增的规律；⑹）特殊个人的作用递减与人民群众的作用递增的规律；⑺）人的发展的不自觉性、片面性递减和自由性、全面性递增的规律。

这样，黄枬森先生开创的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体系就基本上完备和建立起来了。

四、对列宁《哲学笔记》与辩证法的研究

摇摇如前面提到的，黄枬森先生早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期间就师从我国首位康德哲学专家郑昕先生，打下了坚实的康德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在受到不能讲课而安排到资料室工作的不公正待遇的逆境下，他发挥自己学术造诣的优势，从 1960 年起开始对列宁的《哲学笔记》进行注释的工作。经过直到 1981 年长达 20 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和北京大学的其他学者们一起，推出了达 50 万字的《〈哲学笔记〉注释》，做出了苏联哲学界长期所没有的重大贡献。在此基础上他又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自己长期研究的成果，于 1984 年出版了学术专著《〈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开中国学者对《哲学笔记》做出研究性专著的先河。与此同时，他还指导研究生完成了一些很有价值、得到学界肯定和嘉奖的有关《哲学笔记》的著作。对此，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定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以黄枬森为代表、以完整研究列宁《哲学笔记》与辩证法为主旨的独特学派。

除《哲学笔记》外，黄枬森先生还顶住国内外学术界对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贬低、攻击，乃至否定的浪潮，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实事求是地精深研究，他的结论是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这主要集中表现在它把辩证法和实践观点引入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从而使它发展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体系。但他也认为，这部带有明显的论战性质的著作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缺点和不足，如就认识的辩证法而论，就没有讲感性认识如何转化为理性认识的问题；此外，对一些科学家的评价也有失误等。

为了如实地认识和评价列宁的理论和实践，黄枬森先生还与人合著了《列宁传》，于 1989 年出版。这部著作的导言收在 1999 年出版的《黄枬森自选集》里，标题就是“列宁是人不是神”。

黄枬森先生的学术成就远不止上述的四个方面。我认为，这四个方面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建设、来创新和发展的终身追求所取得的标志性的重大成就。这些成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增添了一大笔财富。他的这种勋业将彪炳史册，永不褪色！

参考文献：

《哲学的足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人学的足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黄枬森自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9 年版。
《哲学的科学化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哲学的科学化——黄枬森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21 世纪哲学创新——黄枬森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